

后 记

我的这部自传也许简单平实,但所反映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受到启发,纵使不能借此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认识。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1876年),一个英国公司为了方便做生意,在上海和吴淞之间修筑了一条铁路,可是出了车祸,一个中国士兵被火车轧死了,于是清政府就出资收购这条短短的铁路,并把它拆掉了。同年,清政府派郭嵩焘为驻伦敦公使,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长期驻外公使。随后,一批海军学员,包括严复在内,被送往英国学习,他们回国后为我国的海军建设发挥了作用。再早几年,就是从1872年起的几年里,120名学童由容闳负责,被送往美国接受教育,其中一些人后来在我国政府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名字我在这部自传中都已提到。总之一句话,中国在那时才开始有心尝试西方文化与文明,慢慢地、犹犹豫豫地迈出了第一步。我出生的那一年,光绪帝也只是个孩子,此前三年,同治帝逝世,光绪帝即位,朝廷大权就由两宫皇太后掌握。

在外交方面,中国面临重重困难:俄国侵占我国新疆伊犁地区;日本吞并琉球群岛;中英两国之间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只是在我出生的前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才得以解决;在越南,我国与法国也发生了冲突。无疑,这一连串的国际事件,促使保守的清廷和高级官员,如总督曾国藩、李鸿章等同

意派遣留学生,学习现代西方成就中有关物质、技术方面的知识。

我的父亲在大约 60 岁时曾对我们兄弟几个说,“哎,孩子们,我很遗憾在我的有生之年将看不到国家的富强,但你们比我幸运,应该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从那时至今,将近 50 年过去了,而我们不无悲哀地仍在对我们的孩子重复我们的父亲对我们所说过的话。

但是,如果由此而推断出我国在这几十年中没有什么进步,或者认为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总体上还不能说有多好、多方便,甚至认为从多方面来看,我国比五六十年前并没有好上多少,那就完全错了。举例来说,首先看现代教育,在我们那个时代,即使在上海也没有文法学校,我们只得在国外先上两年预科,以便获得入美国大学的资格。那时,在美国的我国留学生数量之少,只需掰手指头就可以算过来。而今天,几乎每个省都有正规的大学,不少毕业生在现代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享誉海内外。记得 35 年前,满洲设立防疫处时,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一位受过现代医学教育、有足够的资格来主管该处的国人,而今天,我们已有成百上千医务人员出色地工作在医疗卫生战线上,他们中有现代医学教授、临床医生等。那时候,我们曾经希望我国能尽快在每一个学术领域和科技部门至少有一位代表,那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就能感到十分荣耀,而在今天这个时代,每个学术领域和科技部门,我们何止只有一个代表!

著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最能证明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发展。40 多年前,投资仅几千元的商务印书馆在河南路桥附近的一所普通房子里诞生了。现在,它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而它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出版和印制教科书。如今的商务印书馆资

产已达几百万元,编辑人员和印厂工人共有几千人。早些时候,数量有限的中学和大学里,讲授现代课程不得不使用英语,这种情况现在完全改变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是由于高质量的中文教科书的出版。现代科学的每一个分支现在都已有了相应的中文术语,专门名字。中文教科书的出版,使这些课程都可以使用汉语来进行教学,事情本应如此,因为使用外语进行教学,绝不可能快速地、经济地落实大规模的国家教育计划。中文教科书的出版,是符合逻辑的,是必要的。

在平民教育方面,虽然已有行动,但仍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一个国家有如此庞大的文盲人口,怎能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呢。扫盲运动看来是解决这个困难无比的问题的一种办法,平民教育社虽然已编辑出版了几百万册《识字课本》,但只是杯水车薪,触到了这个问题的皮毛,只有使扫盲运动成为政府行为而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才能够收到显著的成效。苏联与我国有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一些做法也许我国可以采用,对我国解决文盲问题将会有益。

在物质方面,我们同样亲眼目睹了巨大的成就,例如,通讯手段与交通运输工具的飞速进步,这可以由电报系统、铁路、公路和近年来无线电报、航空的发展得到充分证明。过去出门到某地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只需几天就够了。国内贸易额的增长难以准确估计,而我国对外贸易的明显发展,则可以从海关的统计中清楚地看出来。虽然由于很大的贸易逆差,对于这样的外贸是否对我国有利值得怀疑,但是,生活肯定因为很多工业品的输入而变得舒适和丰富多彩。我国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各种工商企业公司的组建,内外贸商品分配销售方法的改进,使从事商业贸易的几百

万国人受益,这种情况是前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尽管过去也有著名的十三行在早期对外贸易中交上好运的神奇故事。通商口岸忙碌和繁荣的景象(此次战争之前),至少见证了我们在物质方面正在走向富庶和幸福。

但是,中国,一个几百年以来始终以农为本的国家,只有当其百姓的主要营生,也就是土地耕作,得到根本上的科学的改进,才能逐步富裕和幸福。但是过去只是间断地进行了一些试验,近年才开始大规模地推广科学种田。如果不能适当地、系统地解决科学种田问题(没有人会低估这方面的巨大困难,无论是从量的方面,还是从延续了上百年的保守传统方面来看),那么我国人民在通向物质富裕的道路上仍然会遇到巨大困难。

我们从国外回来的人,最感压抑和悲哀的是看到我国平民大众是如此贫困,他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不上西方国家的牛马。他们的食物、衣服、住房、医疗、卫生状况、教育设施、消遣等等——总之,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准之低、质量之劣,真是令人震惊。可耕地和粮食产量始终没有增长,而人口已成倍增长。这些年来,对农民的税收非但没有减征,反而增加,总的来说,农民的生活由于战争和盗匪更无保障了。

也许除了沙俄的农奴之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其他阶级的境况比我国农民更悲惨了,尽管这样,我国农民仍以极大的忍耐力和知足心态承载起沉重的负担。正如一位专家在描述农村情况时所说:“农业产量既低,又连年闹饥荒。”至于农民耕作,全凭一代代传下来的经验,谈不上科学知识,因此很难有所改进。田间耕作是一门科学,但土地所有者并不懂得运用科学的重要性和由此将带来的巨大收益,而我国农民即便懂得这个道理,也缺乏条件实施改

进。他们的前景看来的确十分暗淡。复兴农业和发展农业机械已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而至今在这个问题上仅采取了有限的几项措施。只有当农业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农民的生活水平才会有相应的提高。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将仍然是农业,但同时必须推进部分工业化进程,为近千万人创造就业机会。巨大的失业人群的存在,必然带来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无任何理由不去利用我国丰富的物质资源,例如矿产资源,为我国和为世界谋福利。中国大地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如:煤、铁、石油、金、铜、汞、铅、锌和锡等等,但我们只是在近些年里,才认识到开发这些矿藏的重要性。

我们所需要的是资金和技术。一俟战争结束,恢复和平后,我们应该引进外资和邀请外国工程师来帮助我们实施工业计划,我国工业计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战后世界经济的重建。我国工业计划中特别重要的是轻工业,例如,棉麻纺织业,其可为我国 4.5 亿人提供衣料,又如米面加工业,其可为人们提供日常用粮。至于日用品的机械化生产发展情况,对比我国众多人口的巨大需求,也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在机械化和工业化方面,我国也许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而战后,这方面的差距可能会拉得更大。这里还要强调的是,中国始终是本国和外国商品的最大的潜在市场,这一点提请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务必注意。

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那些国家里,有一些团体目光短浅,他们对于中国近些年来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深感不安,认为这将减少中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从而削弱中国作为一个外国商品销售市场的价值。因此,他们采取种种迂回手段压制甚至阻碍中国的工业

现代化,企图使中国永久成为他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但是,他们的这个目的是不会得逞的。中华民族是智慧、勤劳、奋发进取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又蕴藏有所需的各种原材料,面对大好机会,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足以证明他们的目的只能是一场白日梦。再者,在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里,人们的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由于我国的工业现代化起步如此之晚,存在的问题如此之多,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赶上发达国家,更不用说超过了;当我国能够用机械生产较为简单和普通的产品时,发达国家早就开始生产更为复杂、难度更大的物品了。

希特勒发表过很多演说,其中有一段分析了“白种人”的优越地位,他说:“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形势是,对于白种民族来说,如果能意识到对政治意志和经济活动的支配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那么,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白种民族)不是输出人口(如中国为缓解人口过剩必然导致的结果所做的那样),而是输出商品,并建立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只有当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生活水准仍然存在差距的情况下,白种民族才能实际上维持他们的地位。如果今天你使我们所谓的出口市场具有与我们自己同样的生活水平,你将发现白种民族再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优越地位了……”。不言而喻,希特勒的结论是极其错误的。

为了使我国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市场,至少有必要部分实现工业化,以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其实有些道理再清楚不过,如果因为我国的落后,甚至基础工业都没有建立,从而使我国人民挣扎在贫穷和失业的深渊之中,那么,根本就不要指望他们有能力去多买从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进口的商品。从我们对

于世界经贸的知识和经验来看,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大的贸易量和贸易额,不是在两个工业都不发达的国家之间,也不是在一个高度发达和一个不发达的两国之间,而是在两个都高度发达的国家之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人民才都具有最强的购买力。因此,如前所说,战后世界发达国家应该将富余的资金借贷给中国,将不用的技术提供给中国,帮助中国工业化,以使中国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市场。

这里虽然描绘了一幅物质方面的和知识方面的光明前景,但是,我国全体人民尤其是政治家,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改造也是必要的。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而依然存在,与中国同样古老的其他民族,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在世界上已经无足轻重,这绝不是偶然的,这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品质的伟大的民族。但同时,我们对于本民族的缺点和不足绝不能视而不见,如果我们想使我们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改造获得成功,那么,这些缺点和不足必须改正。

仅仅在科学技术层面发展现代教育是不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的。随着旧的道德体系的瓦解,传统观念的种种约束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对于当权者来说已不复存在,而新的体系还没有建立,忠诚、廉正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品质不良的人一旦掌握了现代知识,只会是“如虎添翼”,使他能有更多更“高明”的手段去盘剥和控制国人。由这种情况产生的问题的确很严重,已发展到相当危险的程度。因此,“革面”与“洗心”必须同时进行。

如果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用不客气的字眼来描述我们的民族性格,那么,这些字眼对我们的民族性格所表达的应是责备,而不

是表扬。那就是我们太顺从、太忍耐、太屈服于苛政和徇私枉法。一言以蔽之：太“软弱”。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国内的种种暴力、对于来自于外国的侵略和蹂躏太听之任之。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所谓“审慎”与“明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规避眼前的危险，就像蚕躲进蚕茧之中。任何有人身危险的事情、任何需要冒一定风险的事情、或是对某人的所作所为进行揭露，都会被告之以不可行，禁忌与束缚真是太多了。自古以来，先哲圣贤们的教导总是强调以恶当善，以善报恶，甚至要我们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有人打了你左脸，还转过去让人打右脸。可是这样做，并非出于原谅和宽恕之心，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利，只是为了保住个人性命。这样的理念和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只能是欺软怕硬。

在军阀横行各省的年代里，文职官员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省长官，然而往往是文职官员而不是军阀，成为群众、报纸和省议会的攻击对象。因为攻击军阀显然会有个人危险，军阀手中有枪，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对付任何批评和反对者。所以，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真正掌权者始终是军人或准军人，这绝不是偶然的，可以预料，这种状况将继续存在多年，直至人民力量不断增长，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时为止。

在当代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里，不可能发生本国士兵抢劫乡里、鱼肉百姓的事情，或者官员暴虐专断、不善治理而可久居官位的现象，因为各行各业的民众绝不会答应，他们必然会起而反抗。他们也绝不能容忍自身受到侮辱和侵犯，或身在异国他乡而受到所在国的歧视，就像我国华侨所受到的那样。一旦受到这种歧视，他们绝不会不采取强有力的、团结一致自卫措施或报复手段，不管有没有母国政府的支持。

据记载,早在日本成为强国之前,外国人在日本绝不敢如同在我国那样胡作非为,因为日本人,即便是黄包车夫,每遇攻击,必然回手,绝不示弱,而那些武上道者如受到侮辱,则毫不犹豫地拔剑相向。我们的民族要变得强大,首先必须每一个人要变得强硬起来,舍此别无他法。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没有达到现代国家应具有的那种高度。我们还分不清忠于某个人与忠于国家、忠于职守之间的区别。在中国,我们所谓的为民为国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忠于一人一姓而已。当然,曾几何时,欧洲也是如此,比如说,两百年前,一个法国士兵只认为自己是这个主教或那个公爵的部下,而不认为自己是法国的一名士兵。直到不久之前,我们的士兵还更多地认为自己是军阀甲或将帅乙的侍卫,而几乎没有中华民国的士兵这一概念。每一个军阀都开办自己的军事学校 and 政治学院等,在自己的部属中训练一批军官和培养一批政治人员,这样的军官和政治人员都绝对忠于这个军阀,反过来,这个军阀则长期任用他们,成为他们的衣食父母。

东方文化和传统,常常有利于形成极端讲究私人关系的人生观,要使国人开始将国家置于个人之上,忠于祖国和国旗胜于效忠某党派或某集团,还需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教育。不经过长期的教育,使之完成人生观的转变,那么,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和周期性的多少带有暴力的动乱绝不可能完全避免。尤其是中国既已采用了民主政体,国家首脑的位子,就没有人可以永久垄断,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继承。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总统走马灯似的更换以及随之而来的骚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段落中的要旨。

中国的政治哲学十分关注国家管理中的官吏贪污、亲贵擅权两种丑恶现象,我们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曾对这两种丑恶现象

痛加谴责。当然,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特别在殖民地,我们也不必过分细述我们自己的短处。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区别只是程度和广度而已,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问题更严重,这是令人痛心的,而此严重之最,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政权的更替,国家高层领导中的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现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发展。

过去,旧官僚、旧军阀中的腐败故事层出不穷,确实让人以为问题极为严重,但是,与人们在私下议论的当今的腐败情况相比较,却是小巫见大巫了。过去,至少还有一套文官制度,官员只要忠于职守,凭能力和资历总会得到升迁和荣誉。但是现在,重能力和资历的规矩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亲信和党徒却往往鸡犬升天,败坏了国家机关的风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例子不胜枚举,结果,无论对于任职者个人,还是对于他所负责的公务都没有好处。

过去的中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民主性,国家公职通过科举制度向所有德才兼备者开放,我们所赞美的许多著名政治家原来都是社会下层的贫穷学者。裙带关系无疑使很多有地位的家族的子孙能踏进做官的门槛,但是,晋升更高的职位需凭个人才下,单靠关系获得升迁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在国家危难之时,明智的国君以其足见多识和爱国之心,会将指引国家度过难关的重任托付给有经验和有能力之人,甚至是那些在平常时期自己并不喜欢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朝代经常能躲过劫难而一代代传下去,超常地延续了寿命。如果统治者在选择文武官员时坚持党派偏见和个人偏爱,那么,他们当权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阅读我国的史书,实不难得出这样的教训。

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人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旅行

了,中国的各个地区比过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各地的民众也因此开始感觉到大家都是同一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某一省份的百姓,但是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我们的政治家们却在用人方面,在看待公共事务的观点方面,仍然没有摆脱地方主义的束缚,

以前,北京政府曾经有一条规定,每当内阁改组,内阁人选总是保留一两个空额,安排南方人士,意在向国民表明政府是全体国民的政府。这种观念无疑值得赞扬,而现今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但令人惊讶的是,过去那种以省界结成帮派体系,什么直系、皖系、奉系等等,相互混战,争权夺利的恶劣做法,在现今仍在发生影响。只要政治家抱住帮派观念不放,处理问题总带着偏见,那么,我们的所谓统一只能是表面上的、省级性质的。

民国初年所采用的代议政治制度,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议员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视为“奇货”,待价而沽。在三次总统选举时,议员们不是公开要价,就是暗地索贿。

要想使议会制度和民主政府名副其实,成功运作,除了其他条件之外,还需要存在几个政党,比如说二三个政党,一个为执政党,另外的为反对党。在一些国家里,帮派、小集团、小山头大量存在,从它们的政纲、历史沿革,甚至地域状况来看,很难加以区别,它们的各自结合只是因为个人崇拜、个人利益、甚至个人好恶。这种情况有利于孳生阴谋诡计、形成破坏势力,而有害于政府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真正民主的国家里,绝不会使民众误以为:国会议员就像他们自己一样;议员代表的只是他们选区的观点和利益;议员如果不被满意,下一次选举就可以取消其资格等等。但总的来说,普通民众对选举并不感兴趣,许多人从不去投票,也不知道候选人的政治

观点,更不去听候选人的竞选演说、当选后要为选民做什么之类的承诺。整个选举过程,从候选人的产生,到候选人正式当选,实际是由对这位候选人感兴趣的小型政治机器,也即政党在操纵。

当然,在几百名国会议员之中,肯定有热情、真诚、本意良好的议员,然而,他们对国家问题的观点和影响,在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下,已被后来大批的不审慎、不诚实和追私逐利的所谓立法者们所遮盖了。有一种观念认为,大部分有身份地位的公民都会加入一个党派,因为他们持有的政治观点具有普遍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希望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目的能够实现。这种观念其实与孔子的教导以及传统的认识,也即“君子群而不党”是不相符的。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多数政党的历史,不足以证明它们可以不被列入“帮派”的范畴,而帮派正是孔夫子在他的教诲中痛加贬斥的。

要理解伟大的政治组织所具有的全新概念,就如同要理解西方的民主所具有的全新概念一样,要从它们爱国的和历史的背景、从它们为国家利益而去实现某一理想的勃勃雄心、从它们的公职意识、从它们在继承和丰富自身传统方面所作出的真诚努力、以及从它们对于合法的反对党的容忍,这样多方面去考察;真正伟大的政治组织绝不会企图永久垄断统治权,不会将国家的财富和资源用于自私的目的,不会搞卑鄙无耻的政党分赃,对于要求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的其他团体也不会加以压制。如果不想让国家面临政治瓦解和最终发生动乱,那么,必须尽快地从上述概念来理解,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才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组织。

在采用共和制政体中所表现出的急切心情和盲目热情,说明我们并不真正懂得,一个共和国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年中就成功建

立起来,而是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和准备,因为各方面的进步,包括政治的进步,并非可以跳跃式来完成,而是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完成。

自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建立起一党专政并始终维持之。一党专政自然会引起非国民党员的不满,包括非党人士和其他政党的党员,他们也都要求参政权。虽然在理论上,国民党的人门是向每个中国公民开放的,但是很多人的感觉是,一党专政与封建时代的家天下和极权主义国家的个人独裁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应了解,受过充分训练的、有经验的称职人员极为有限,如果还是只从国民党员中选择人员,那么,其结果将是可选择的人更有限、更难以令人满意。只有充分发挥中国所有人才的作用,才能形成一股力量,足以担当起复兴中国的沉重而艰巨的任务。除了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操作之外,一党专权,就是在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将救亡的重任放在了一党的肩上,这对于一党来说,真是难以承受之重,而且从长久来说,对于该党也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无论从实际操作,还是从政治的立场来看,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应是爱国与明智的举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体制改革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出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常任驻美公使赴美之前,我向蒋介石将军提出了改革问题,蒋将军当时表示理解,并对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1/3成员应由非国民党员构成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不少著名学者被邀请到南京开会,正是他们提出了上述建议,以此折中办法取代彻底废除一党专政,可以避免因彻底废除而引起国民党员的极力反对。

1934年当我返回南京时,我又将这个问题向一位政府高级官

员提出,因为在过去的3年中,政府实际没有采纳与无党派人士、与各党派人士合作的建议。我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党外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已成为过去,国民党打算不久就采用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代议制政府。然而,时过10年之后(我的自传写于1941年),执政党的这一非同寻常的打算仍然只是个“打算”。

两年多之前,成立了一个国民参政会,在这个机构中,各个党派和政治集团可以自由交换观点,不过,这个机构并非由选举产生,而它的决议也几乎没有被重庆国民党政府采纳实施过。相反,重庆国民党政府采取种种手段迫使文官武将加入国民党。读者也许会回想起宣统三年(1911年)北京有过一个类似的“资政院”,^①那时革命兴起的理由之一,就是缺少一个直接地真正地代表民意的机构,而这样一个机构是维持和构成政治民主的一个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关于迟迟没有实行宪政的问题,官方最近的解释或说辩护,包含在蒋介石将军于1939年2月21日,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

诚然,蒋介石将军关于国民政府过去的遭遇,和我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困难所作的陈述,完全正确,不容置疑。但是,怀有苛责心理的一般人也许对此种解释并不满意,他们认为革命之后已经过了30年,我国人民所能享受的政治权利,直至现在,与满清时代差别无几。的确,我国政治巨轮,转动缓慢,尽管改换了不少政治上的名词和术语,历史却是一代又一代地重演,只是那些健忘者易忘罢了。

① 原书时间似有误,应为宣统二年。——译者

我们不能不再回过来谈谈敌国强加于我国的前所未有的灾难。4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的大好河山遭受战争的蹂躏,我们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伤亡的士兵、千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以及遭炸毁的家宅、田地、工厂、学校和庙宇,到处是断墙残垣,满目疮痍,这一切都是这场战争的恶果。

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对我们的道德和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同胞看到已发生的事情,非常泄气,对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他们原本对我国的国防力量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随着我军一步步的撤退,一省一省国土的沦丧,他们变得迷惑不解、毫无信心了。几大最富裕的省份落入敌手,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财产损失,和无数的文化机构横遭破坏,对他们的打击太沉重了,使他们伤心至极。他们开始相信不管眼前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修补创伤。极度的悲观使他们认为这场灾难是命中注定的,只能认命,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战争对于我国民众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心灵的另一个影响是,他们开始感到绝望。他们看到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计划都已落空,他们感到被许多所谓的救国的理论、主义所欺骗,而多少对于那些理论和主义的倡导人物失去了信心,他们必然会去试验新的方法和制度,寻找新的领头人。然而,几乎没有什么方法没被试验过了,况且根据我们的历史知识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并不存在完全理想的方法。闪亮的并非都是金子,这一格言对于一些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

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过分悲观,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毕竟经历过多次浩劫,以往的急风暴雨,我们都经受住了。我们的弱点在考验中可以转化为力量,我们反对战争,而我们不得不投入战争,

这将激励我们去战胜凶恶的敌人。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痛苦和损失确实是难以忍受的,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不是经过这样一个阶段,甚或更长的阶段,而能达到民族团结和奋发图强的顶点的。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战争都是令人厌恶的,但是,在准备抗战、保家为国的过程中,可以锻炼我们的勇气,增强我们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发扬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及培养其他所需的高标准的道德品质。当然,这样的民族品格可以在平时时期以和平的方式来培养发展,然而不幸的是,粗鲁的甚至残酷的方式往往更奏效。

目前的灾难,也是我们作自我检讨的好机会。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难道我们自己没有一点责任?个人应尽的职责,国家应尽的职责,是否都尽到了?有无失职之处?是怎样失职的?我们打扫房间是否打扫得很干净?我们的政治是否无瑕可击?我们处理内政外交是否妥当、明智?有关腐败、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公正和违规操作的种种说法,是否完全属实?眼前虽然没有时间从各方面去查实,但是,哪怕做一点点自我反省,也将大大有助于准备再战,以夺取最后胜利。

与其他民族相比,我们的同胞名声不好,因为内部不团结,将家庭和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于异国统治者和异国统治逆来顺受。在目前的战争中,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生命财产的代价,而我们也得到了最大的收获,这就是团结,国家的民族的团结。广大的民众,当然包括在国内外的各党派的领导,空前地团结起来,过去的“一盘散沙”,现在在抗战的神圣使命面前凝结成了一个整体。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大陆发生过,各个不同民族的团结,大都也是通过对外战争,现在,古老的亚洲大地上,各民族也在抵抗外

来战争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通过这次危机,我们所获得的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必须依靠自己。我们的一些同胞过于天真,长期以来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援助上。我们要懂得,援助是有区别的,一种是按照条约规定给予的援助,另一种是出于同情和友谊给予的援助。虽然援助有道义上的和司法上的区别,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绝不可以强迫别人援助。现在国际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不理想,是令人悲哀的,然而,“自强不息”无论如何是最要紧的,虽然,我们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我们的民族将在战火中净化道德,赢得国家声誉。

在我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我已一再提到在我国前进和新生的道路上,他国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及如何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力求争取主动的重要性。曾经有一位苏联高级官员问我,为什么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一切枷锁彻底砸碎,一步达到自由、富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的。我回答说,中国如果没收外国在中国境内的投资,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那么,停泊在中国水域的外国军舰就会向中国开炮,起码中国沿海和各港口都是在外国军队控制之下,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苏联。

我曾问另一位苏联外交官,苏联政府是否考虑偿还列强的旧债,因为列强国每一位新任驻苏大使提交国书后肯定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不、绝不!”接着又说:“在外交上,没有比债务问题更简单容易解决的问题了。只要置之不理,事过境迁,债权人就会像债务人一样,把这个事情丢到脑后,同时只好把这笔债务转为呆账,逐年摊销了事。”苏联“逃避”债务的做法,在中国就行不

通,毕竟中苏两国的境况不同,更不用说观念和政策上的区别了。

在晚清时期,有一批精明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如恭亲王、庆亲王、曾纪泽、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他们信任和重用贤能之士,因此,在棘手的对外交涉中,常常能起死回生,使问题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也使中国在遭受外国一次次的人侵下,总的来说还能维持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

晚清政治家在善后的外交谈判中多次获得成功,对此,在我刚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外国顾问曾对我这样说,中国在每一次对外战争中都被打败,而在每一次战败后的谈判中都能获胜!他的话虽刺耳,但多少有点道理。不过,人们有时对外交成功持不同看法,往往认为那些条约是丧权辱国的。

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一下近几十年来国家获得的各种新机会和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那么,我们不能否认我国外交部门的进步和所获得的成果。从人事方面来讲,无论是国内外交部的,还是驻外使领馆的人员,都经充分培训、严格筛选而能胜任工作,并保证他们长期任职,只要他们工作称职。而这些外交人员确实是有经验、有谋略的,反应敏捷,手段灵活。他们的综合素质无疑比政府其他各部门的成员高出许多,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可奈何的遗憾的结果。原因在于我们在外交方面的进步远远领先于国家事务的其他方面,如教育、商业、工业、立法、司法、金融、警政、市政管理,尤其是国防,这些方面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少专业人才和领导干部。外交斗争常常需要国内各部门与外交官配合,而各部门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在步调和效果方面,不能达到外交官所预期的,外交官在外交第一线披荆斩棘、勇敢战斗,而国内其他部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他们十分失望。

国内其他部门,当因他们工作失误或准备不足而给国家带来麻烦时,常常指望外交官们创造奇迹,使国家摆脱困境。当我国3位代表出席国联特别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之后,一位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长私下对他们表示崇高敬意,并对他们有关国联机构的丰富知识和卓越辩才表示敬佩,但是,他认为他们代表的并非真正的中国,因为真正的中国与他们描绘陈述的不一样。这位外交部长这样说,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当我国在国际会议上或直接外交谈判中取得一些胜利时,民众方面,起码有些不甘寂寞者就会感到既得意又不满足,进而提出过分要求,要求收复被外国攫夺的我国权利和领土,而这些问题并非一时能解决的。当时中国负责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对此采取保留和沉默的态度,而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卤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这种兴师动众的宣传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看起来很成功,而给国际外交斗争带来的却是灾难。在处理棘手的外交问题时,必须考虑我国军事力量不足,其他各方面准备不够,以及所处的不利的国际环境,采取冒险的蛮干的做法,虽说动机是爱国的,但效果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事情就这样办好了。因此,虽然一次又一次国际风云变幻,险象环生,他们却总能发挥专家们的才智,把握机会,从而驱散乌云,指引国家航船安全避开狂风暴雨的侵袭。或迟或早一场激烈的社会变动必将到来,迎接这场风

暴有不同的方法,其不同点在于各自代表人类思想和行动的两大进程——民主与渐进和集权与革命。

最终拯救中国,究竟依靠上面改弦更张,还是依靠下层发动革命,多少年来争论未决。在我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治乱循环,决不见鲜见,一位贤能明君的出现,就会出现一朝太平盛世。真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①我国国民非常守法,善于效仿榜样,愿意随时为家庭幸福和国家繁荣辛勤劳作和贡献智慧与力量。所以,仁慈和强有力的统治者,只需维持天下太平,保障国家安全,就可以开创一个隆盛的黄金时代。千百万民众所求只是安居乐业,读书人有书读,农民有地耕,手艺人活干,商人有买卖做。

几百年来,我国人口繁衍激增,为了生存,粮食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来自这方面的经济压力极为沉重。记得孩提时代,吃饭时必须把碗中的米饭都吃干净,掉在桌布上甚至掉在地板上的饭粒都要捡起来送进嘴里,由此使我们特别注意爱惜粮食。我曾对一位美国朋友谈到,中国人与西方人吃的不同,中国人的食物中有品种繁多的蔬菜,新鲜可口。这位朋友反过来却说,很可能是中国人太穷了吃不起肉。他的话虽使我吃惊,但也许是正确的。

《论语·子贡》上记载,孔子在回答子贡问政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迫于无奈,必须放弃其中之一,应首先放弃哪一项?孔子立刻回答说,“去兵”。孔子看重粮食,将粮食对于民众的重要性与民众对于国君的信任联系起来,因为他认为,如果没有了民众对于国君的信任,国也将不复存在。

① 见《论语·颜渊》。——译者

读者当能回忆起袁世凯任总统时的内阁部长梁敦彦先生,他认为,要使中国从根本上获救,必须尽快行动。他赞同派遣几千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待他们回国后,将古老的保守的中国,改造成富有朝气的、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并且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毫无疑问,为了尽快见效,中国必须有一套改革方案,并且必须自上而下地推行,这里就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收到“风行草偃”的效果。在当代国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是日本,明治维新 70 年来,它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但在相反的方面,不少洞察我国问题的人士,认为复兴我国的变革,必将自下而上来发动,因为下层民众中蕴涵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认为采取自下而上的道路复兴中国,所需时间肯定比自上而下地进行要多许多年,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能把基础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之上,而不是浅滩流沙之上,那么,多几十年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观点其实带有一定程度的悲观和失望情绪,起因在于国家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在于近年来的改革措施见效甚少,甚至少有改革的想法。中国地域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而民众的性格、习惯,尤其是人生观如此保守,各具特质,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一个晚上就使中国获得再生,简直是异想天开。大约 20 年前,我在北京出席一次欧美同学会的聚会,一些著名的教授也参加了,当有人向我提出如何医治中国这个问题时,我的回答简洁而明了,只有两个字:“时间”。如果今天再向我提出这一问题,回答仍是同样的,还是“时间”。

如果说中日战争对我们还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唤醒了我国民众,使之认清了外敌人侵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带来的灾难,警觉到了国家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国际组织中,一个向

被忽视、受欺侮、缺乏防御能力的会员国,尽管按比例交纳最多的会费,而受到外来侵略时,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社会下层各阶级通过侵略者发动的事变和抗击侵略者的过程,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并要求社会的重视,和得到他们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只有通过社会基本群众,也即国家人口中的最大部分的迅速觉醒,我们才能盼来国家真正的、彻底的和持久的复兴。计划已经制订了很多,而相对来说,完成的却很少,因为无论是从教育入手,还是采取其他政治手段,都只是触及了一下表面。然而,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的实际经验说明,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教育手段和其他政治手段,并非以一个排斥另一个,虽然可能以一种手段为主,另一种为辅,但无论如何,两者是服务于同一目的的。

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遭受空前的破坏,重建工作必将是艰巨繁重的,所需时间也必然长久。在死亡的灰烬和荒芜的废墟之中,将站立起来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幸福、现代、民主、强大、美丽的中国,这是对我国人民坚强不屈和勤劳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好检验。在艰巨的重建工作中,最重要最需要的,莫过于睿智、廉洁、果敢的领袖人物。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重建新中国的各项活动中无不 需要领袖。

现在谈谈领袖问题。最近有一本关于欧洲领袖的书,载有一位领袖讲的一段充满智慧的话:“领导艺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作为领袖,绝不能落在运动之后,落后会使自己被群众孤立。反之,也不能跑在运动之前,超前会使自己脱离群众。聪明的领袖领导一个运动时必须兼顾两头——既不许有人掉在后面,也不应让人跑得太前。”

将这一段格言运用于我国,那么,让我们记住,即使领袖的动

机再好,目的再纯,而远远地跑在群众前头,使群众无法跟上,这样做也是不明智的。一个领袖如果自以为群众像自己一样坚强、能干、进步,就会经常做出太超前的理想化的事情,而结果往往完全不是他所预期的,这样不仅使他自己感到失望,也会使他的党派泄气。在领袖看来简单易做的事情,对领袖的追随者来说却是难而又难,那么,领袖的计划必然失败。

另一方面,作为领袖,必须具备领导能力,必须去领导。如果他不去领导,或领导不了,那么,他必然失去领袖资格,由别人取而代之。这似乎是一个让人信服的法则。如果一个领袖落在太后面,跟不上群众,必然招致孤立,换句话说,他就会被群众抛弃,群众不管有没有领袖,会照样前进。特别在我国,过去的封建传统要求一国之君深居宫闱,不露真容,这样的国君形同偶像,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在一帮阿谀逢迎的小人营造的虚幻世界之中,可想而知,其地位之脆弱,远胜于欧美国家的元首。

有一件确凿的历史事实,袁世凯被野心驱使,大搞帝制复辟时,他的一位老友和同僚去拜访他,谈话时,这位老友暗示袁世凯,有的外国可能反对他称帝。可是袁世凯却说:“不,没有。这里有一张最近的《顺天时报》,报上说非常赞成这件事。”《顺天时报》是日本人的喉舌,老友看了一眼,发现这张报纸与外面发行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实际上,袁世凯看到的《顺天时报》是专为他个人编印的。国家元首竟被身边的一伙官吏愚弄,听不到真实的声音,看不到事情的真相,这在西方国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无法相信的。

最后,我想再一次引用孔子关于道德榜样对民众的影响的教导来结束全文。在《论语》中,孔子反复强调,对于国君来说,道德

垂范远比其他治国之策重要，一味惩罚并不能使民众遵纪守法。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们的领袖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务必切记。